

書評

階級：引爆貿易戰的元兇

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賴威沛 *Wei Pei Lai*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PhD.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一、前言

這是一本從國內政策視角剖析國家之間貿易戰的根源之書，指出一國政府有意在階級結構和財富分配的政策操作直接導致貿易順差，而且無論民主或專制政體，都有類似的現象。

隨著美中貿易戰開打，美國的官方說法多集中在所謂的「不公平貿易」，¹其中美中之間逐年擴大的貿易逆差，更是雙方爭執的具體議題。更有為數眾多文獻從貿易逆差、爭奪霸權、國內政治等不同面向分析貿易戰帶來的影響。²

¹ 〈貿易戰來勢洶洶，美宣布對華 600 億美元商品加稅〉，《BBC NEWS 中文網》，2018 年 3 月 22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3500214.amp>.

² Sung Eun Kim and Yotam Margalit, "Tariffs As Electoral Weapon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 No.1 (2021), pp.1-38, Larisa Kapustina, Eudmila Lipková, Yakov Silin and Andrei Drevalov, "US-China Trade War: Causes and Outcomes," *SHS Web Conferences*, No.73, (2020), pp.1-13.

<https://doi.org/10.1051/shsconf/202073010> IES2019 12 12.

and Terence Tai Leung Chong and Xiaoyang, "Understanding the China-US trade

作者馬修·克蘭恩 (Mathew C. Klein) 和麥可·佩提斯 (Michael Pettis) 為資深金融投資家，以多年實務經驗進入學院教學研究，於投資生涯中觀察許多國家發展經驗，遂得以國內政策的角度詮釋貿易逆差成因。行文之間，作者對於新自由主義提出反思，該主義頑固地反對政府與貿易逆差的觀點已幾近宗教狂熱，無論適不適合當地國情。反之，被認為過時的凱因斯經濟學則重新獲得關注，昔日凱因斯提出「節儉的矛盾」來解釋個體與總體經濟之間的差異，如今用來解釋國際貿易現象仍然擲地有聲。

全書由貿易順差至上的觀點出發，首先闡明近代貿易興盛的要素，指出金融流動如何驅動貿易流動，接著運用國民所得會計闡明貿易的均衡與失衡，並以中國和德國為例佐證其觀點，最後回到美國美元霸權，邏輯嚴謹，環環相扣。既提出相關假設，也有實例印證。無論接受與否，都值得深受國際貿易影響的我們仔細思考，國內是否有類似的現象，並作為政府執行相關政策的參考。

二、全球貿易轉型的真相

故事從亞當斯密 (Adam Smith) 開始說起。眾所周知，亞當斯密從「大頭針」工廠的觀察中，提出了生產力的核心要素 - 分工。其後的李嘉圖 (David Ricardo) 更主張在兩國間透過分工提高整體產出的「比較利益原理 (Comparative Advantage)」¹。然而彼時受限於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技術，跨國生產成本仍然高昂，國際貿易和投資仍有其侷限性。

真正大幅降低國際貿易成本的是貨櫃輪運輸。有效率的裝載與標準化貨櫃縮短貨物裝卸的時間，也降低商品運輸成本，從事跨國生產的誘因大增。然而全球價值鏈與港口卻嚴重扭曲了貿易數據。舉例來說，德國汽車公司生產的汽車，有一半以上是在德國以外製造，而德國本身的汽車出口價值，也

war :causes economic impact, and the worst-case scenari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Vol.7, No. 2 (2019), pp.185-202.

有大約三分之一是來自他的鄰國。³貿易數據扭曲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企業避稅行為，為了達成避稅目的，企業和個人開始在全球安排營收和利潤的產生地和流動，使貿易數據嚴重失真。於是要真正還原貿易數據，全球金融補足了這個重大缺口。

三、全球金融之秘

作者提出三種不同的方式思考貿易與金融之間的關係。第一種思考方式是，國際資金流動可能主要是由貿易金融組成，或者說這些金融業務活動是受相對生產與運輸成本所推動。基於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則，貿易失衡不可能變得特別大，也不可能長年居高不下，因為恆久的順差或逆差會引發國內發生各種調整。⁴

第二種思考方式是，國際金融流動可能是由積極在世界各地搜尋最具生產力機會的理性(rational)投資活動所組成。以這個情境來說，金融可能從富裕的成熟國家流向快速成長的開發中國家，因此，貿易失衡可能由成熟國家的貿易順差和開發中的貿易逆差所組成。⁵

第三種思考方式是，主要的金融技術包含股權、債務與保險。由於信用快速擴張，投資人取得資金容易，加上投資人越來越敢承擔風險，以及外國證券大量發行，均使得放款與外國投資活動大行其道。全球金融情勢對跨國金融流動的影響，經常遠大於本地成長展望對跨國金融流動的影響，這種最貼近現實情況。⁶

經過檢視近兩百年來發生的國際放款熱潮，作者認為全球金融情勢對跨國金融流動的影響，經常遠大於本地成長展望對跨國金融流動的影響。換句話說，由於金融制度變動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同時對於經常帳產生巨大影

³馬修·克蘭恩、麥可·佩提，〈貿易戰就是階級戰〉，《台北：麥田出版，2022年》，頁79。

⁴ 同前註，頁98。

⁵ 同前註。

⁶ 同前註，頁102。

響，因而產生貿易順差。

四、儲蓄、投資與失衡

全球的所有經濟產出不是被消費掉，就是被用來發展生產性資產。作者利用以下幾個簡單的等式表達儲蓄與投資的關係：⁷

全球需求=全球生產

需求=消費+投資

生產=消費+儲蓄

國內需求=GDP+進口-出口

出口-進口=國內儲蓄-國內投資

由上面的等式不難看出，消費不足會導致需求不足，而消費不足也會使得生產過剩，必須輸出由國外吸納，其結果即為貿易順差。而消費不足隱含投資機會不多，因此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存底也必須輸出國外，使資金流入國債務增加。

由於投資是發展經濟的必要元素，當國內生產活動已達到最大產能的水準，基本上有兩個方法可取得投資所需財源：從國內消費者身上移轉資源(高儲蓄模型)，或是從其他國家移轉資源-作法是提高進口相對出口的水準(高工資模型)。⁸

投資= (GDP-消費) + (進口-出口)

高儲蓄模型將使一般民眾減少消費，好讓政府和企業獲得更多資源以增加支出。此種模式並非新創，農奴時代就存在。就現代意義來說，為權

⁷ 同前註，頁 136-137。

⁸ 同前註，頁 138。

貴階級將壓縮消費所結餘用來支付基礎建設與資本財的生產性投資。此種模型最極端的例子當屬史達林領導下的蘇維埃聯盟（Soviet Union，簡稱蘇聯）。一九一七年的布爾什維克政變以及後續俄羅斯的拒絕償還外債，還有意識形態作祟，造成外國資金卻步，連帶導致資金匱乏。⁹然而史達林仍堅持工業化，在缺乏國外資金的情形下，只能藉由農產品的出口來獲取資本，這也表示必須在國內剝削、壓榨農民，於是農民益發貧窮。二次大戰後的日本、中國(大躍進)都曾採取此種高儲蓄模型。高儲蓄模型一個很重要的特徵是，勞工被刻意壓抑消費，將儲蓄轉移至政府或企業，使其更有能力將儲蓄用以國內或輸出國外賺取高投報率；勞工即使有消費需求亦因工資被刻意壓低而必須以增加負債方式。其結果是隨著全球化深化，貧富差距亦隨之日益擴大。

美國無疑是高工資模型的代表國家。十八至十九世紀的美國處於此種模型的有利地位，充沛的土地與開明的制度，加上逐年增長的人口，使美國勞工享有高工資。對於美國看好的發展前景，吸引來自歐洲的儲蓄，和前述高儲蓄模型不同的是，美國無須犧牲勞工的消費以提高儲蓄率，而是將流入的儲蓄用以發展資本，進一步提高生產力，形成正向循環。

五、反思：貿易戰究竟是不是等於階級戰？

當古典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貿易起源自兩國的比較優勢，而國家間基礎條件的差異，工資相對便宜的國家得以出口勞力密集產品換取資本密集產品，兩國間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必然不利於某些產業直接導致受害產業失業人數增加，如果斷然指涉貿易順差國是造成失業的論調，似乎有些因果錯置。畢竟貿易順差反映一種結果。

回應作者的核心觀點：

⁹ 同前註，頁 144-145。

壓低工資→消費不足導致生產過剩→出口→貿易順差→順差盈餘流往貿易逆差國(需要資金)→繼續進口→.....

很明顯這是站在偏左派的觀點從國內階級不平等的角度切入，論述貿易失衡及隨之引起的國際衝突，由國內階級不平等觀點解釋全球經濟失衡，相當程度補充了傳統經濟學理論的缺口。然而以下有幾個相應的觀察與思考：首先，包含台灣在內許多國家在產業發展過程中都曾以廉價勞動力為發展基礎，就作者觀點此係政府有意壓抑消費同時將資源轉往權貴政府或企業，在以出口消弭國內生產與消費失衡的同時也提供政府和企業進行國際資金流動的能量。若此論點為真，則貿易順差國在逐年累積順差的同時，其國內的不平等情況應會擴大。如此，當可進行大規模跨國性比較，以進一步驗證堅實性。其次，國際金融理論告訴我們，當順差國累積巨額貿易順時，順差國政府未強力介入下，該國貨幣將升值，此時順差國貨幣購買力增加，有增加所得的效果，有利於進口消費，或有助於降低國內不平等。最後，造成國內不平等的變因和矯正機制，必須由租稅體系改革入手。¹⁰ 固然在其他條件相同之下，低工資比高工資較容易產生貿易順差，不過工資高低與否或與政府政策相關，但其根本仍在於生產力高低；至於消弭不平等，仍然要從財稅政策的有效規劃與執行做起。如能從握有盈餘的企業多課租稅(以資產稅補充所得稅)的手段進行重分配，或許能部分減緩不平等情形惡化。只是政客的政治利益與企業主的利潤密不可分之下，租稅改革又是那麼遙不可及。

最後，適逢中國經濟轉型，已逐漸從世界工廠轉為以內需為主，是否將逐年減少貿易順差並改善其國內不平等現象，值得進一步關注。

責任編輯：吳家綺

¹⁰ Joseph E. Stiglitz, "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An Agenda for Growth and Shared Prosperity,"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2015).